

道德經

(圖文本)

(春秋) 老子 著

Daodejing

道德經

(圖文本)



(春秋) 老子 著
周生春 注評

鳳凰出版傳媒集團
鳳凰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道德经:图文本/(春秋)老子著;周生春注评. —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1

ISBN 978-7-80729-149-7

I. 道… II. ①老… ②周… III. 道家 IV. B22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87507 号

书 名 道德经(图文本)
著 者 (春秋)老 子著 周生春注评
责任编辑 王华宝 樊 昕
责任美编 姜 嵩
书籍插图 吕 波 吕 莉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原江苏古籍出版社)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发行部电话 025—83223462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制 版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
印 刷 者 扬中市印刷有限公司
扬中市科技园区东进大道 6 号 邮编 212212
开 本 718×1005 毫米 1/16
印 张 11.75
字 数 130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80729-149-7
定 价 23.00 元

(凤凰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老子》是一部文约义丰的经典之作，从文字到思想内容都称得上深奥难懂。为帮助读者了解《老子》，以下拟从老子其人，《老子》的成书年代和传本，《老子》的哲学思想，其人生观、政治观和战争观，近年来有关《老子》的两个议题，及其历史地位和影响出发，对老子及其著作作一简要的介绍。

老子和《老子》的成书年代

关于老子其人及其所撰《老子》一书，历来就存在各种不同的说法。

一种意见认为，老子就是老聃。老聃是周朝的“守藏室之史”，即管理藏书的史官，后退隐，著书五千多字，论述“道”、“德”之意。老聃的生卒年现已无考，只知道他生活的时代稍早于孔子，或与孔子同时。

一种意见认为，老子是战国时人李耳。李耳是《老子》的著者。

另一种意见认为，老子即周太史儋，是战国中期人。《老子》的著者不是老聃，而是太史儋。

还有一种意见认为，老子即老莱子，是与孔子同时代的楚国人。

关于《老子》这本书的成书年代，历来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有人认为，《老子》是春秋末年老聃的作品，也可能是老聃学说的记录，编成于战国前期或孟子生活的时代；或成书于《墨子》、《孟子》二书成书之际。

又有人认为,《老子》成书于战国中期或战国末期。时间大约在孔、墨之后,孟、庄之前;或墨子、孟子之后,庄子之前;甚至在《庄子》成书时代之后。

还有人认为,《老子》写成于秦汉之间,晚于《吕氏春秋》,而早于《淮南子》。

根据先秦典籍的记载,我认为,老子就是老聃,《老子》一书的基本思想应该出自老聃。

在《庄子》、《吕氏春秋》和《韩非子》等先秦典籍中,都有关于老聃的记载。如《吕氏春秋·当染》篇说:“孔子学于老聃。”这和《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孔子“将问礼于老子”,老子告诫孔子的记载是一致的。又同书《不二》篇说:“老聃贵柔,孔子贵仁。”《韩非子》书中《解老》、《喻老》等篇则大量引用了《老子》的言论,或阐述了《老子》的观点。如《六反》篇引述说:“老聃有言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内储说下·六微》篇则说:“权势不可以借人……其说在老聃之言失鱼也。”以上二处老聃之言分别见于今本《老子》第四十四章和三十六章。这些古籍所引老聃的言论和《老子》一书的记载并没有什么出入,它们从不同的角度描绘出一个思想面貌大体相同的学者老聃,其思想与《老子》一书的思想基本相符。据此可知,老子就是老聃,《老子》一书的基本思想就是老聃的思想。这本是先秦时期的定论,只是到了秦以后,才出现太史儋或李耳是老子、《老子》并非老聃所作的说法。

《老子》一书的基本思想虽出自老聃,但它却并非完成于老聃一人之手。

在《老子》书中,含有大量春秋时不可能存在,战国时才出现的用语和现象。《老子》一书中“万乘之主”、“取天下”等词语的运用,《老子》对“仁”、“义”、“礼”和“尚贤”的否定,都说明了这一点。对此,前人早已

论及，兹不赘述。

不过，人们往往没有注意到，事情还存在着另外一面：在《老子》书中还含有一些春秋时期才有，战国时已不复存在的现象和不再使用的词语。春秋时期，中原地区小国林立，当时进行的战争，主要是大国之间为争夺霸主地位以号令小国的争霸斗争。战国时则不然。当时进行的战争，主要是以攻灭他国为目的的兼并战争。《老子》说：“大国以下小国，则取小国。小国以下大国，则取大国。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国不过欲兼畜人。小国不过欲入事人。夫两者各得其所，大者宜为下。”它所反映的应是春秋时期，而不是战国时期的情况。

又春秋时，周天子在政治上还多少保存着一些威望和影响，世卿制度虽已动摇，但尚未消灭。到战国时，周天子的威望已扫地以尽，世卿制向官僚制的转化已经完成，卿士的地位已被宰相、丞相、相邦等官僚所取代。因此，帛书《老子》说：“故立天子，置三卿，虽有共之璧以先四马，不若坐而进此（指‘道’）。”它所反映的应是春秋时期，而不是战国时的现实。这也是后人将帛书《老子》中的“卿”字改为“公”字的原因所在。

此外，1973年12月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帛书甲本、乙本《老子》，（时代在秦汉之际）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楚墓出土了竹简本《老子》，其内容虽大致相同，文字和篇章次序等却存在相当大的差异。

显然，惟一的解释只能是：《老子》一书并非由一人执笔，成于一时，而是出于众人之手。它是经过相当长一段时间的不断修改和补充，才汇编写成的。恐怕正是因为太史儋和李耳都参与了《老子》一书的编写，后人才把他俩当成老子。

《庄子·应帝王》篇说：“老聃曰：‘明王之治，功盖天下，而似不自己；化贷万物，而民弗恃；有莫举名，使物自喜；立乎不测，而游于无有者也。’”这些话正与《老子》一书的思想相符。又《庄子·天下》篇说：“老

聃曰：‘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谿。知其白，守其辱，为天下谷。’”这句话又见于帛书《老子》甲本、乙本，两者所载字字相同。《应帝王》篇成书于战国中期，《天下》篇成书于战国中期以后，《韩非子》、《吕氏春秋》成书于战国末，由此推断，《老子》应成书于《庄子》内篇成书之前，在战国中前期即已存在。

考古的发现完全可以证明这一观点。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楚墓出土了竹简本《老子》，其墓葬的年代约在公元前4世纪中期至3世纪初。据此可知，老子和《老子》成书的时代应在公元前300年之前，而不可能在此之后。

又按《史记·老子韩非列传》所引老子家谱世系，老子的七世孙为汉文帝时人。无论按一代二十年还是一代三十年计，他都是战国中期人，其时代恰与太史儋相同。所以《老子》一书的基本思想虽出自老聃，但最后将它修改补充，汇编写成，并扩大其影响的，很可能是战国中期的太史儋和李耳。

综上所述，《老子》一书的基本思想出自春秋末的老聃。从郭店楚墓简本《老子》来看，公元前300年之前《老子》的篇幅虽只有今本的一半不到，各章次序亦与今本有别，但文字已与今本大同小异，这是《老子》初步形成的时期。又从马王堆汉墓帛书本《老子》来看，经战国中期人编修补充，除道篇、德篇前后次序不同外，其篇幅、各章次序已与今本一致，文字亦与今本大同小异，这是《老子》基本形成的时期。汉至三国则是《老子》的结构和文字最后定型的时期。

《老子》一书的文本

《老子》这部书的版本很多。魏晋以来流传较广的当推王弼注本和河上公注本。王弼，三国时魏人，是著名的玄学家。王弼注本属于文人

系统,其流派为苏辙、吴澄诸本。不过,现存的王弼《老子注》正文和注文颇有出入,已非旧本。河上公旧说为汉文帝时人。河上公注本接近民间系统,其流派为景龙碑本、遂州碑本和敦煌的六朝、唐写本。

除以上二种注本外,时间较早的本子还有严遵本和傅奕本。严遵,东汉人。他所撰写的《道德真经指归》现只存论述“德”篇的一部分。傅奕,唐初人。他根据北齐时项羽妾墓出土的“项羽妾本”、北魏道士寇谦之所传“安丘望本”以及齐处士仇狱所传“河上丈人本”校订《老子》,所成定本,人称傅奕本。

此外,时间较早的本子尚有从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老子》甲本和乙本。甲本字体介于篆、隶之间,不避刘邦名讳,当是刘邦称帝以前的抄本。乙本用隶书抄成,避刘邦名讳,而不避汉文帝刘恒名讳,应是高祖、文帝之间的抄本。帛书本德篇在前,道篇在后,而今本道篇在前,德篇在后。

时代最早的古本却是湖北荆门郭店楚墓出土的简本《老子》,简本《老子》的时代约在公元前4世纪中期至3世纪初。简本《老子》有甲、乙、丙3组不同的文字,只有1700多字,帛书本、今本则有5千字。简本《老子》无道篇、德篇之分,各章次序、思想内容与帛书本、今本存在较大差异。

从《老子》的成书过程和文本的演变来说,简本和帛书本是其初步形成和基本形成时期的代表作,王弼注本是《老子》最后定型的版本。本书在注释和翻译《老子》一书时将充分考虑这一点,在重视、依据简本和帛书本的同时,将王弼注本作为校勘的底本。

老子的哲学思想

老子的思想是围绕着“道”这一观念而展开的。

老子所说的“道”，并非人们通常所讲的道路、规律、天之道或人之道，而是既“无名”，又“有名”的一个实体。他所说的“名”，也不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名称或名字，而是与实际内容相对应的形式和形态。老子的“道”一方面“寂兮”、“寥兮”、“恍兮”、“惚兮”，寂静无声，空虚无形。另一方面，它又“其中有象”，“其中有物”，是一实实在在的事物，有具体的形象。显然，老子所说的“道”是一客观存在的实体。这个浑然一体、不可割裂的东西，先于天地而生。它独立存在，永远也不会改变。它具有实体及其法则或规律这二方面的意义。

老子认为，“道”是宇宙万物的本质。“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含有真实可信的事物的本质。“道”产生万物，万物其中有信”，含有真实可信的事物的本质。“道”产生万物，万物产生后又向它回归。“道”好似万物的宗主，它是万物的汇归之地，万物都归附于它。“道”在万物中的体现称作“德”。“孔德之容，惟道是从。”大“德”的样子，一切以“道”为转移。天得到它就澄清，地得到它就安宁，神得到它就灵验，川谷得到它就盈满，侯王得到它就成为天下的君长。“道法自然”，它是自然的缩影和化身，是大自然及其规律的代名词。

“道”又是宇宙万物的本原。“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道”产生“一”，即原始的统一体。“一”既看不见，听不到，无声无形而摸不着，但又不是虚诞不实，灭绝不明和子虚乌有，只是不能具体描述、形容而已。由“道”“先天、地生”，“无名，天地之始”，可知“二”应指天、地。“三”指由天、地产生的阴气、阳气和阴阳混合之气，万物均由这三者生成，所以万物都内涵着阴、阳两种对立的势力，而以阴阳激荡混合作为和谐。“道生一”以下数句是老子用来解释“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的。由此可见：“有名”是万物的根源，天下万物无一不产生于天、地这样的具体的有形之物；“无名”则

是万物的始端,具体的有形之物均产生于“道”和无形的“一”。

“道”的运动就是向相反方向的转化。在《老子》一书中,“道”被称作“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它的运动轨迹是由近及远,越离越远,但最终又由远处返回。天、地和人均取法于“道”,无一不是如此。如对于万物来说,“道”使其从无形成为有形;但“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又使其从有形转化为无形。无形既是万物运动的起点,又是万物运动的终点、归宿和本根。

在这种运动中,“道”通过“弱”发挥作用,它具体体现为“弱”。这就是老子所说的:“弱者道之用。”例如,在老子“曲则全”、弱胜强的思想中,“道”就是通过或表现为柔弱和委曲,来实现它的运动,使委曲转化为保全,使“强”走向它的反面。正因为如此,老子才认为:当“朴散则为器”,无形之“朴”成为有形之物后,只要“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谿”,“知其荣,守其辱,为天下谷”,甘居雌柔、卑下,就又会回归到质朴。

从返朴归根和“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出发,老子阐发了他的具有崇无贵弱特色的辩证思想。他认为:“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盈,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是一种普遍的现象,有无、难易、长短、高下、音声和先后都是对立统一的,矛盾对立的双方互以对方作为存在的前提,没有“有”,也就没有“无”,反之亦然。这种矛盾双方的对立并不是凝固不变的,而是可以互相转化的。例如,老子就曾指出:“合抱之木,生于毫末”,“正复为奇,善复为妖”。

由于“无”和“朴”是万物的根本和必然的归宿,“道”是通过“弱”发挥其作用的,老子在对立的双方中就特别重视属于“无”、“朴”和“弱”的一方。他主张无知、无欲、无为、无争和不言,主张守雌好静,认为“强大处下,柔弱处上”。这就形成了以崇无贵弱为其特点的辩证思想。

老子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但作为二千多年前的思想家,由于时代的局限,其辩证法又不可避免地带有某些缺陷。老子从互相排斥、对立和矛盾的事物中,看到并指出了它们互相依存和互相转化的关系。但是,他却没能指出这种对立面的同一是有条件的、暂时的和相对的。正可变为奇,善可变为妖。但并非所有的正都会变为奇,也不是所有的善都会变为妖。他认为,“唯之与诃,相去几何?善之与恶,相去若何?人之所畏,不可不畏人”。他又说:“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孰知其极?其无正。”在这里,老子只看到唯与诃、善与恶、人之所畏和畏人、祸与福的互相转化,而没有指出这种转化并不是无条件的和绝对的。这使他无视以至于抹杀它们之间的界限和区别。

此外,老子又片面地强调矛盾对立双方的同一,认为“知和曰常,知常曰明”。这就使得他忽视了对立双方的矛盾斗争,没能看到对立双方的转化是通过斗争实现的。

由于老子既没有认识到对立面的同一是有条件的,又没有认识到矛盾的斗争性寓于同一性之中,他就以为对立双方的转化是必然发生的,是自发进行的,不须假借任何人力。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老子得出了“无为,故无败;无执,故无失”的结论,提出了无为、无事、无争、守雌好静、“柔弱胜刚强”的主张。他企图用这一办法使自己在矛盾转化的过程中永远立于不败之地,以避免对立面的转化所造成的危害。但这样一来,他就不能认识到并非一切柔和的东西都能战胜刚强的东西,不能认识到主观能动力量的重要性,以致过分强调柔弱无为,从而使自己的思想不仅陷于片面,而且带有消极保守的色彩。

老子的哲学在其认识论上也具有独特之处。老子认为,认识事物应从其本质——“道”入手。“天下有始,以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复守其母”。只要抓住并认识万物的本质——“道”,就能

认识天下万物,就能“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就能不行而知,不见而名。

老子认为,要认识“道”,一方面要“无欲”,即不带任何主观的欲望或目的。闻“道”者必须“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只有达到虚无的境界,心静无所欲求,才能认识万物的本原或“道”的虚无的一面。另一方面,又要“有欲”。“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即通过观察万物的兴起、发展和向其虚无的本原的回归,来观察“道”所运行的轨迹,认识“道”有形可见的一面。

在认识了“道”并据此了解天下万物之后,老子认为认识的过程就已完成,因而主张堵住耳目口鼻,关闭感知的大门,“绝学”、“弃知”,返回到无知、无欲的纯朴状态。

老子主张通过观察万物来认识其本质。这使他的认识论具有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因素。此外,他又认识到,只有通过理性思维才能认识事物的本质。这一观点也是值得肯定的。

另外,老子又主张只有无欲,才能认识无形之“道”的奥妙,这就使他的认识论带有神秘的色彩,但同时又揭示了一种独特的认知方式和与众不同的思维模式。

但是,老子片面夸大了“道”的作用,并将其绝对化。他不了解:认识始于实践,经过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又回到实践,这是一个反复深入,不能脱离实践和感性认识,也不是一次能够完成的过程。老子的“道”不是最后的绝对真理。人们不能在认识“道”之后,就堵塞耳目口鼻,放弃学习,固步自封。

老子的人生观、政治观和战争观

形而上的“道”表现在具体事物上,就成为“德”。“德”是“道”的具

体体现和作用。老子认为“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他主张“贵食母”，即从“德”那里吸取养料，提倡积“德”为善。在老子的眼中，“德”构成了人们思想、言论和行为的准则。老子所说的“德”，包含并反映了他的人生观、政治观和战争观。

“孔德之容，惟道是从”。“道”是天地万物的本原、归宿和本质，是自然的缩影和化身。“道”的运动总是向相反的方向转化，这种运动是通过“弱”起作用的。“德”顺从“道”，从“道”中衍化出其内容和本质，它的核心就是自然、无为、柔弱和知止。这构成了老子人生观的精髓。

所谓自然，是指一切顺乎自然，“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值得注意的是，老子所说的无为，并非没有任何作为，而是指人应辅助自然，而不能违背自然，逆“道”行事。从这一点出发，老子再三强调无为、无事、不言或希言的重要，主张“生而不有，……长而不宰”。既然一切都是自然发生的，人不能违背自然，妄自作为，那么，人就不能“生生”或“益生”，就应懂得“和曰常”的道理，就应“知止”、“知足”。既然矛盾的转化是必然的，那么，人就应顺从自然；对付困难，要在它还容易克服时动手；做大事，要在它还是小事时着手。

所谓无为和守朴，是指保持无知、无欲、纯朴、原始的状态。所谓柔弱、知止，则是指处于雌柔卑弱，而又蒸蒸向上的状态。以上是老子在矛盾转化的过程中，为避免灾难所采取的主要原则。从无为和守朴出发，老子将无知、无欲、无私置于十分重要的地位，从而提出了“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绝学无忧”的主张。柔弱、知止的原则意味着人“曲则全”，“物壮则老”，“强梁者不得其死”。因此，人们应安守雌柔卑弱，“自知不自见”，“自爱不自贵”，“去甚、去奢、去泰”，发扬不争、谦退、收敛、柔慈和“不敢为天下先”的精神。

顺从自然和无为、柔弱、知止也是老子政治观的核心。老子赞赏政治上“愚民”，反对“察察”为政。他认为，最好统治者应该没有私心，以老百姓的想法作为自己的想法，勇于献身于治理天下。这样的统治者“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以无所事事来取得天下，治理天下，人民几乎感觉不到他的存在。

在实施统治的过程中，老子反对依靠才智治理国家。他主张以无为、清静使人民潜移默化，以无事、无欲使人民富足、淳朴。他的终极目标是使人民返回到无知、无欲、淳朴、自然的状态中去。

根据对立的双方必然向对立面转化的观点，老子制定了他的政治策略：

一、尊贵者应以卑贱为根本，以卑下为基础，这样才能保住自己的地位。

二、将事情消灭在萌芽状态之中，也就是要在事情没有发生时采取行动，要在混乱尚未产生时着手治理。

三、欲擒故纵，欲强故弱，欲取故予。

四、永远使人民有所畏惧。因此，不能关闭人民住所的大门，不能堵塞人民的生路，不要使人民不畏惧死亡。

老子的战争观也是建立在自然、无为、柔弱和知止的基础上的。老子认为：“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粪；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战争是天下无“道”的必然结果，是由于人们的贪欲和不知足造成的。老子指出，发动战争的人终将自食其果。所以，他认为：“兵者，不祥之器”；君子只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动用它。在不得已而用兵时，老子又提醒人们注意“兵强则不胜”的原则，主张取得战果应及早住手，不能依靠武力逞强于天下。老子主张以无所事事来取得天下，如果喜欢用兵，喜欢杀人，那就不能得志于天下。

老子的历史地位及其影响

老子是先秦道家学派的创始人,他所创立的学说极大地推动了他所在时代的思想的发展。在老子生活的时代,天命鬼神和尊神敬天的思想虽已遭到怀疑,但尚未从根本上被动摇或否定,上帝和天仍然被视为万物的主宰和本原。一些先进的思想家所能做到的至多只是避开这一话题,闭口不谈它们而已。例如,子产认为:“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左传》昭公十八年)孔子则主张:“敬鬼神而远之。”(《论语·雍也》)老子的贡献就在于:他扩大了“道”的含义,赋予“道”以新的内涵,并形成系统的学说。按照这一新的学说,“道”被看作天地万物的本质和本原。以往是“道”从属于天,现在则是天从属于“道”。老子在充分意识到天地万物之间存在着一种普遍的规律、共同的本质和本原的基础上,概括提出了一个不是上帝或神,但又高于上帝和神,作为自然的缩影和化身的最高本体——“道”。这就从根本上动摇和否定了上帝和天的地位。这一新的学说的产生,意味着春秋时期人们的认识出现了一次重大的飞跃,可以被看作是人们的抽象思维能力获得长足进展的一项标志。

在老子生活时代,由于天和上帝的地位已经受到怀疑,人们往往注重社会和人事,比较关注伦理道德,重视人生和政治问题。其视野多局限于这些现实问题之内。作为卓尔独立、与众不同的一位大思想家,老子的思想体系以“道”为核心,由“道”和“一”伸展到天地万物、伦理道德、人生和政治,又从人生、政治和伦理道德返回到“朴”和“道”。这就建构起一个完整而又宏大的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的建立,将人们思考的范围从伦理道德、人生和政治,扩展到整个宇宙。这是老子的又一理论贡献。

老子创建的这一完整、宏大的思想理论体系，在更高的层次上超越了西周、春秋时盛行一时的天命观和敬天、保民、明德的思想体系。这使他成为道家学派的开创者，成为中国思想史上继往开来的一代宗师。老子在理论上的这些贡献，不仅使他在他那一个时代思想发展的过程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一席之地，而且使他在以后中国思想和传统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影响。

老子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影响和重要性，仅次于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孔子所创立的儒学在中国长期成为官方的正统思想。老子的思想虽然只在汉初和魏晋这两个时期成为统治阶级的主导思想，但它却深深地影响了整个封建时代思想的发展。在诸子百家、佛教、道教，甚至官方儒学的思想中，往往可以找到老子影响的痕迹和烙印。

战国时，老子的思想对庄子、齐国的稷下学派和法家学派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庄子是继老子之后道家学派的一位伟大思想家，“其学无所不窥，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史记·老子韩非列传》），深受老子思想的影响。他继承、发挥了老子的无中生有说，利用老子辩证法中对立面的转化不讲条件的缺陷，把它引向了相对主义。战国时，齐国稷下学士田骈、接子和环渊诸人，“皆学黄老道德之术，因发明序其指意”（《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亦与老子有渊源关系。此外，法家学派中，“申子之学本于黄老”，韩非子之学亦“归本于黄老”。（《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申不害继承并改造了老子无为而治的思想，提出了君主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君道无为，臣道有为的思想。韩非子继承、发挥了老子的思想，提出“理”是具体事物的规律，“道”是万物之“理”的总和。他针对老子的辩证法只讲同一，不讲斗争，只讲转化，不讲条件的缺点，着重强调矛盾的斗争性，比较全面地发挥并阐述了矛盾转化的观点。

西汉初，黄老之学一度成为统治阶级的主导思想。黄老之学属于

道家学派,深受老子思想的影响。例如西汉时成书的《淮南子》,“其旨近老子,淡泊无为,蹈虚守静”。(高诱《淮南子叙》)《淮南子》继承、改造和发挥了老子无中生有的思想,提出了从“无”产生宇宙、气和天地的观点。这一宇宙生成说直接影响了汉代大天文学家张衡的思想。

魏晋时,受老子思想影响很深的玄学成为当时社会的统治思想。玄学的创始人何晏和王弼继承、发挥了老子“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的宇宙生成说。他们将只有时间上的先后,只有生成与被生成关系的“有”、“无”解释成本体和作用。在给予老子的“有”、“无”以新的含义,将“时间在先”的“无”改换成“逻辑在先”的“无”以后,他们进而提出了“无”为本、“有”为末的唯心主义的体用说。

在丧失其统治地位后,老子仍拥有很高的地位,他的思想也仍然对人们有着巨大的影响,为人们所接受,并不断被加以各种的改造。例如汉以来产生的道教,即将《老子》一书奉为经典,称之为《道德真经》,并将老子尊为教主。早期的道教利用老子的神秘性和“长生久视”等观点,来宣扬其长生不死、成神成仙的思想。五斗米道令其信徒诵习《老子》五千言。晋人葛洪将老子的“道”当作“一”,并神化“道”和“一”,使之成为上帝的代名词。在此基础上,他提出只要守“一”,便能成为神仙的观点,从而建立起道教的理论基础。到了唐代,老子被捧为“太上玄元皇帝”。道教的理论家司马承祯在吸收佛教思想的同时,又根据老子“无欲”可以认识“道”的奥妙,达到虚无的境界就是万物发展变化的极点和尽头,保持静止就是没有偏离万物根本的观点,提出了“虚静至极”就可以得“道”和长生不死的理论。(《坐忘论·泰定》)

老子的思想对中国的佛教也有一定的影响。举例来说,佛教传入中国之初,为便于传授,常用老子的虚无、无为之说,来解释佛教的“涅槃”、“寂静”和一切皆空的思想。玄学兴起后,与其相通的佛学般若学